

# 先秦时期山东地区的巫文化与 山东道教的产生<sup>\*</sup>

赵 芃 刘燕妮

远古中国“巫风”盛行，道教根植于中国古代社会，直接延续、承袭了远古时代的神道巫风。山东是中国道教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均反映出东周之前山东巫文化的“繁荣昌盛”。至春秋战国，随着理性思潮的高涨，巫逐渐丧失了其政治地位，渐次下移到民间，有的则演变为方士，这便促进了山东道教的前身——方仙道在燕、齐沿海地区的兴起。可以说，先秦时期山东巫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乃为山东道教产生前的酝酿、准备阶段。

**关键词：**山东 巫文化 道教

**作者：**赵芃，1958年生，博士，山东轻工业学院文法学院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刘燕妮，1979年生，山东轻工业学院文法学院讲师。

巫术体现为处在蒙沌时期的人类幻想以超自然的力量和手段来改变周围世界的一种神权信仰意识。它是人类自身趋利避害、祈福求佑，企图改变生存环境和状态，以迫使各种力量受制或服从于人的意志。人类早期所施行的这种行为，构成了人类最初的文化现象，近代人类学家大都认为人类文化源于巫文化。

远古中国“巫风”盛行，自原始时代，巫术就与神灵和宗教紧密结合，中国的原始宗教有着浓厚的巫术色彩。道教根植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原始宗教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其直接延续、承袭了远古时代的神道巫风。如道教的方术、占卜、斋醮、符篆、禁咒等，都有明显的巫术特征，而方士、道士所宣扬的学说无非是对原始巫术的革新和再造。葛兆光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巫术“就是道教的‘正宗’、‘嫡系’。”<sup>①</sup> 山东是中国道教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先秦时期，山东的巫文化是山东道教产生、发展的重要文化渊源。

## 一、考古学反映的山东巫文化

南怀瑾先生将道教的立教过程，划分为十个演变期。第一个演变期，约当公元前四、五千年，为道教学术思想之远古渊源所本。<sup>②</sup> 这个演变期，就山东地区而言，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近年，考古学蓬勃发展，考古资料是除古文献之外，我们探讨问题的一个更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山东道教史》(09AZJ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

<sup>②</sup> 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重要的依据。据考古资料,在丧葬习俗中深刻地反映出了山东先民的巫文化。

### (一) 山东先民墓葬中的红色崇拜意识

我国早期的宗教形式是图腾崇拜和巫术,学界普遍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萌发了巫术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原始先民的丧葬习俗中。中国最早的墓葬遗址,是北京山顶洞人的墓葬。在北京山顶洞人的墓葬中,人骨周围撒有大量赤铁矿粉,这是最原始的巫术意识的萌芽。关于这一现象,学界普遍的解释是灵魂观念的体现。笔者认为,除具有此种意义之外,结合后期的墓葬发掘分析,这种做法也体现了某种巫术意义。在现代社会,红色依然被人们认为具有辟邪功能。在山东先民的墓葬中这种红色崇拜意识十分明显,所体现的巫术意义清晰、明确。如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 M9 墓中,墓葬填土内含红烧土粒。<sup>①</sup>在枣庄建新遗址中,清理出 13 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墓内填土大都含红烧土颗粒。<sup>②</sup>这里填入的“红烧土颗粒”与北京山顶洞遗址中的“赤铁矿粉”如出一辙,都具有辟邪、庇护的巫术性质。

再如大汶口文化时期,在诸城呈子遗址的一些葬具,内外壁均涂有黄泥,棺底涂朱红色;大汶口遗址的墓葬木棺内还有朱土现象。<sup>③</sup>在泰安大汶口墓地 M47,出土龟甲 1 件,涂有朱彩。<sup>④</sup>这些习俗都与最早出现的“赤铁矿粉”所反映的巫术性质一脉相承。

此外,在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墓葬中发现有随葬朱砂的现象。朱砂,化学名称 HgS,大红色。中国民间传统观念认为,朱砂具有辟邪作用,是人们公认的辟邪灵物,现代很多人将朱砂作成香包随身携带,用来辟邪护身。在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墓地中,棺内大多都撒有朱砂。比如“南岗子”墓地,共 9 座墓葬,在棺内都不均匀地铺撒着厚度不同的朱砂。朱砂厚度均在 0.2 厘米~2 厘米之间,如 M108,棺内不均匀地铺撒着约 0.2 厘米厚的朱砂;而 M105,棺内铺撒有约 2 厘米厚的朱砂。<sup>⑤</sup>

朱砂的巫术意义对后世道教有着深远的影响。道教产生后,遂将朱砂作为其炼丹制药、书写灵符的主要原料。朱砂是道教练丹制药的材料。晋葛洪《抱朴子·黄白》篇中云:“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土也。”《南史·隐逸传下·陶弘景》:“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另外,道家术士写镇妖驱鬼的灵符时,必须用朱砂来书写。

### (二) 某些随葬品的巫术意义

龟甲器。龟,被古人视为通神的灵物。《礼记·礼运》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四灵。”龟的某些自然生理特征在古人看来很神奇,如龟的寿命很长,且具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这些生理特征决定了龟具有通神灵、知吉凶的神性。在图腾信仰时期,龟是许多氏族所崇拜的图腾物。可见,在原始宗教信仰的早期,龟就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宗教色彩。

根据考古发现,墓葬中出土龟甲器最早是在山东,龟甲器始见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王因、大汶口、野店、尚庄、前埠下等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均有发现。据统计,王因遗址发现 3 件,前埠下遗址发现 1 件。大汶口遗址中发现的 20 件龟甲,分别出土于 11 座墓葬中。<sup>⑥</sup>关于随葬龟甲器的意义和用途,考古学者得出不同结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与“巫”有关。如认为墓主可能从事巫医占卜的职业,或认为是巫医驱病魔时用的法器。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岱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199页。

② 同上,第199页。

③⑤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第236-240页、第194页。

④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103页。

在大汶口的墓葬中,还有手握獠牙或獠牙勾形器的习俗。关于此种习俗,学界也有不同的见解。其一说认为是用以护身和辟邪厌胜的器物。这显然具有巫术的观念和含义。

### (三) 葬制的巫术意义

从葬制来看,主要是单人葬、合葬、二次葬、迁出葬几种形式。关于二次葬,从文献记载来看,反映的是一种巫术控制的目的。《梁书·顾宪之传》记载:“山民有病,辄云先亡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由此推测,二次葬具有镇压凶死者的灵魂使之不能作祟的巫术意义。

## 二、山东巫文化的繁荣昌盛阶段

### (一) “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

在《国语·楚语下》中对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的巫文化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及少皞之衰也,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少皞,东夷族的著名首领之一,主要活动于山东曲阜一带。《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少皞之虚,曲阜也,在鲁城内。”在少皞时期,巫文化呈现出“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欣欣向荣”的盛况。这种巫文化的特征是:人人都有充当巫师的资格,人人都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人神可直接对话,而不受身份、社会地位的约束。这表征出:1. 此时山东巫文化的发展尚处于原始阶段。2. 巫没有形成特殊的阶层。3. 神权和王权还是彼此分离的,神权还未落在统治者手中。这种“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现象,显然不利于王权的巩固。因此,剥夺广大民众通神的权利,使神权成为王权的“附庸”,以达到神化王权的目的,成为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出现了“绝地天通”事件。

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sup>①</sup>关于“绝地天通”事件的宗教意义,学界并无疑义。它是中国原始宗教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通过这次宗教改革,产生两大重要结果:1. 王权政治与宗教相结合,实现了最初的政教合一。宗教祭祀权力被统治者垄断,成为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唯一代表,神化了统治阶级,树立了统治权威,宗教成为统治阶级教化民众的最重要的手段。2. 专职巫师开始出现,巫觋集团不仅成为社会上特殊的阶层,也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力量。

“绝地天通”实现了“民神异业”,少数人承担起通神降神的神圣使命,这意味着专职巫师正式出现。自此开始,巫的地位显著提升。

### (二) 殷商时期山东巫文化

“殷商和殷商以前,是巫的鼎盛时期。”<sup>②③</sup>殷商是神权强盛的时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sup>④</sup>这种宗教生活的特点必然决定山东巫文化在殷商时期发展到全盛阶段。祭祀与占卜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活动在殷商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足以证明,殷商是我国历史上占卜活动最为昌盛的时期。山东地区出土的殷商早期的卜龟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特别是济南大辛庄已累计获千余片。

殷商时期,巫术活动主要是为祈求风调雨顺。下面略举一例。在商代,最频繁的巫术活动就

① 《国语·楚语下》。

② [韩]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华文出版社,1999年,序,第4页。

③ 考古资料表明,在山东最早的商文化遗存是中商早期文化。伴随着殷商频繁的对东夷的征伐战争,商文化随之进驻山东地区。由此,我们可知,至迟从殷商中期前段开始,山东的东夷文化出现衰退、消失、重组的剧变,取而代之的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商文化和商文明。因此,殷商的巫文化也是我们探讨山东道教渊源之山东巫文化的重点所在。

④ 《礼记·表記》。

是求雨。根据殷墟出土的卜辞，殷人求雨主要使用两种巫术仪式。一种是乐舞。

丙辰卜，今日奏舞，有从雨。（《合集》12827）

丙辰卜，贞：今日奏舞有从雨。（《合集》12818）

从造字法来看，巫字象人两袖舞形。《说文》中对巫的解释：“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象人两袖舞形。”意思是说，巫通过舞这种仪式来与神进行沟通。这种求雨的巫术行为称为雩。《说文》指出：“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

另一种是“焚巫”的形式，在卜辞中也很常见。

惟女才爇有雨。（《合集》1130 乙）

贞：爇其雨。勿爇亡其雨（《合集》12842）

甲辰卜，爇每。（《合集》19802）

关于爇，《说文》云：“爇，交木然也，从火，交声。”丁山先生对爇的解释是：“焚人以祭神，乃是爇字本义。”<sup>①</sup>因此，卜辞中出现的“爇”，可认定是一种焚人求雨的巫术。在文献中类似的记载可相互印证，如《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淮南子》：“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呼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即将大雨。”

上引卜辞中的女才，陈梦家、丁山都认为指的是女巫，因此，我们可更进一步说，在殷商有“焚巫”求雨的巫术，也就是将女巫立于火上求雨。

### 三、山东道教的前身——方仙道的兴起

#### （一）两周时期的山东巫文化

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山东的巫文化不似殷商时期这般显赫。周初统治者在对夏、商二代成败兴衰的历史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深刻领悟到“天不可信”。周人虽仍依靠“天”、“神”来庇佑王权，但“天”的地位已明显弱化。“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sup>②</sup>因此，周代巫风趋弱，我们从周人的神职系统中可窥见一二。根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在周代的神职系统中，巫官之长“司巫”只相当于中士，而且男巫、女巫数量无数，可见当时巫的地位不高。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理性思潮的高涨，宗教神权观念逐渐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摒弃。人一神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夫民，神之主也”，<sup>③</sup>“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sup>④</sup>民最终走到神的前面，颠覆了殷商以来的神人关系，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尊重和认同，对神的信仰、权威的否定和抹杀。代表神本思想的巫术文化受到冲击，在齐鲁两国都有明显的表现。《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患病，久治不愈，梁丘据与裔款认为巫师事神不力，“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建议杀了祝、史，晏子则提出：“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晏子强调的是国君德的作用，凸显了人的价值，反映了鬼神与人事关系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否定了巫师具有的神秘力量。再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国穆姜对自己的命运的预测并没有盲从占筮的结果，她说：“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有四德者，

①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498页。

② 《礼记·表记》。

③ 《左传·桓公六年》。

④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穆姜认为，人应该有“元、亨、利、贞”四种美德，如果没用这四种美德，即使占筮吉利也不会有好结果。在穆姜的思想观念中所注重的是个人的德对命运的决定作用和影响，而不是占筮的结果。

这个时期，神权衰落，代表神的意志的巫师其地位逐渐沦落，丧失了其政治地位，不再是统治阶层的成员，而渐次下移到民间，有的则演变为方士。

## （二）方仙道的兴起

战国中期，方仙道在山东燕齐沿海地区兴起。“方仙道”，始见于太史公的《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方仙道产生于战国时期的背景和契机得益于人性的解放，巫术难以继续大行其道，阴阳五行学说浸盛。<sup>①</sup>以及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使早期的一批方士从巫觋中蜕变出来。燕齐方士宣扬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是道教的核心教义——神仙信仰的最根本特征。这一理想目标滥觞于先秦的巫文化，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又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冥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随着古代医药学的发展，先民逐渐认识到药物不仅能去除疾病，而且还具有延续生命的神奇作用。“不死之药”无疑蕴含着长生不死的观念，为后世的神仙思想中的长生不死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源泉。

方士集团，以齐地最盛，他们鼓吹肉体成仙、自由飞升，恰好迎合了帝王们希图长生不死、永保富贵的心理。其中尤以秦始皇与汉武帝最为突出，二人为此执著追求、痴迷终生，数次来到山东半岛寻求神仙及不死之药，从而扩大了神仙观念在山东的影响范围，将神仙思想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帝王求仙文化。同时，秦皇汉武大规模的人海求仙活动，极大地刺激了山东沿海地域方士集团的壮大，《盐铁论·散不足二十九》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及秦始皇览怪迂，信谶祥，是卢生求羡门高，徐福等人海求不死之药。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为山东道教的生产提供了思想理论、人员队伍上的准备。

方士文化延续至秦汉时期出现全盛景象，渗透在秦汉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与汉代巫术的再次“复兴”有着必然的关系。至汉代，巫术又受到汉高祖刘邦的推崇。《汉书·高祖纪赞》曰：“及高祖接位，置祠祀焉，则有秦晋梁荆之巫。”汉武帝更是醉心、痴迷于神仙方术，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开篇中这样评价汉武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代巫师发达的直接结果，是催化并促使了道教的生产。”<sup>②</sup>

东汉末，方士文化逐渐被道教取代。方士们所行方术，如祠灶、谷道、却老方、求仙术、候神、望气、导引等等，也均被道教吸收、继承。因此，山东沿海地域的方士文化不仅为山东道教、也为中国道教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和理论内容。

“太平道”创始于汉灵帝时，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太平道信奉《太平经》，“太平道”之名，亦来源于《太平经》。《太平经》是现存的第一部道教经典著作。从《太平经》的作者及内容上来看，我们都可以认定《太平经》是山东道教发展的早期理论成果。据史载，《太平经》的作者

① 张华松：《月神崇拜与方仙信仰》，《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第34页。

② 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39页。

是东汉末年的方士于吉和其弟子宫崇，于吉北海人，宫崇琅琊人，两人都是山东人。《太平经》的内容大量吸收了巫文化的元素。《后汉书·襄楷传》说：“初，顺帝时，琅琊宫崇旨闕，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

在汉代，巫觋、方士、道士是否有明显区别。文镛盛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一书中指出：“汉代巫觋、道士、妖巫、方士等名称并没有明确区分，混合使用。”“可发现汉代巫觋、道士、方士等名称并没有明显地区别使用，彼此之间也相互影响。”<sup>①</sup>然而，“方仙方士的前身是巫觋。巫术与方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招送亡魂，使灵魂得以永生，后者则可以采集或制作仙药，使人长生不死”。<sup>②</sup>这样就使“巫术”和“方术”、“巫觋”和“方士”有了基本的区别和划分。

傅勤家在《中国道教史》中对巫祝至道士的演绎过程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道教，其义理固本之道家，而其信仰实由古之巫祝而来，展转而为秦汉之方士，又演变而成今之道士。然则虽在今日，巫祝仍与道士并行不废，且彼此相混合焉。”<sup>③</sup>这段论述，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巫觋——方士——道士的流变演进过程。山东燕齐沿海一带兴起的方仙道，是山东道教的前身，而“秦汉之方士”又本源于“古之巫祝”，山东地区自古以来的巫文化是山东道教产生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

（责任编辑：于光）

① [韩] 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② 张华松：《月神崇拜与方仙信仰》，《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第34页。

③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43页。